

当代韩国

秋季号

1996 · 9

• CONTEMPORARY KOREA •

总第12期





《游鸭图》，洪世燮(1832—1884)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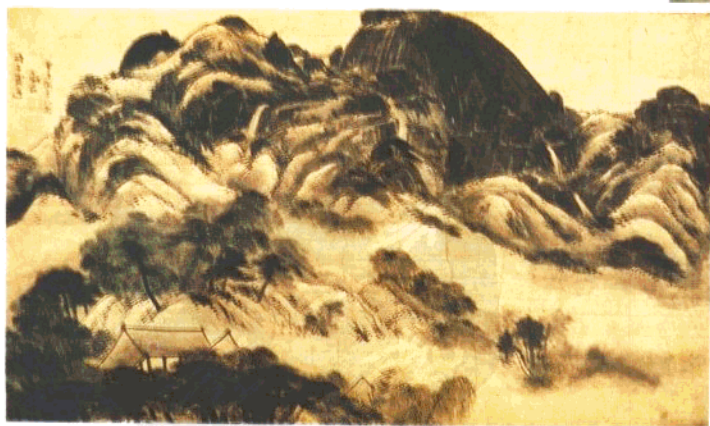


《黑狗图》，金斗梁(1696—1763)

《书堂》，金弘道(作于 18 世纪后期，宝物第 180 号)



《仁旺雨霁色图》，郑澈(作于 1751 年，国宝第 216 号)



韩国文化遗产

韩国的文化遗产



青华白磁“弘治二年”铭松竹文壶(1489 年制作, 国宝第 196 号)



青铜银入丝蒲柳水禽文净瓶(高丽时期, 国宝第 92 号)



青磁阳刻竹节文瓶(12 世纪, 国宝第 169 号)



白磁铁砂葡萄文壶瓶(17 世纪下半叶, 国宝第 107 号)



圣德大王神钟(统一新罗时代, 771 年, 国宝第 29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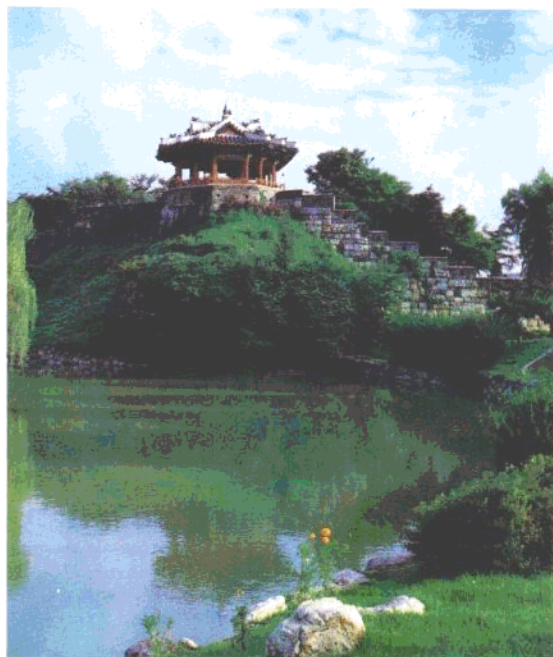
传统餐桌(16 世纪后期制作)



竹制衣柜(16 世纪)



修建水原城、提倡孝道的正祖大王(1752—1800)



倒映在一龙渊中的访花随柳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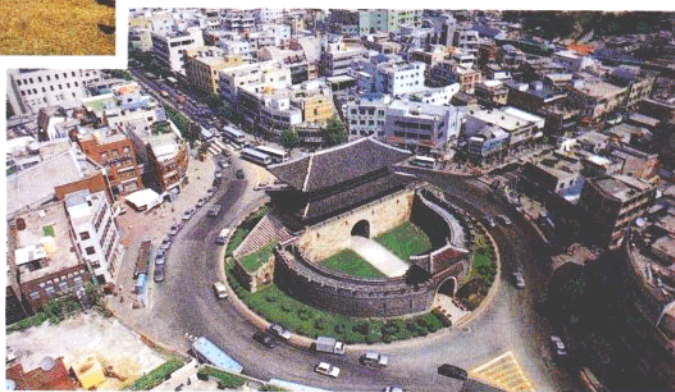
正祖大王的陵寝——健陵



庄献世子(正祖之父)陵寝——龙陵

水原市风光

八达门铜钟龙位寺梵钟



水原城八达门(南门)



西二雉(水原雉城)

水原市风光



三星集团工业区的工厂



建在提岩里教会旧址上的独立运动纪念馆

亚洲大学医院



京畿科学高中电脑教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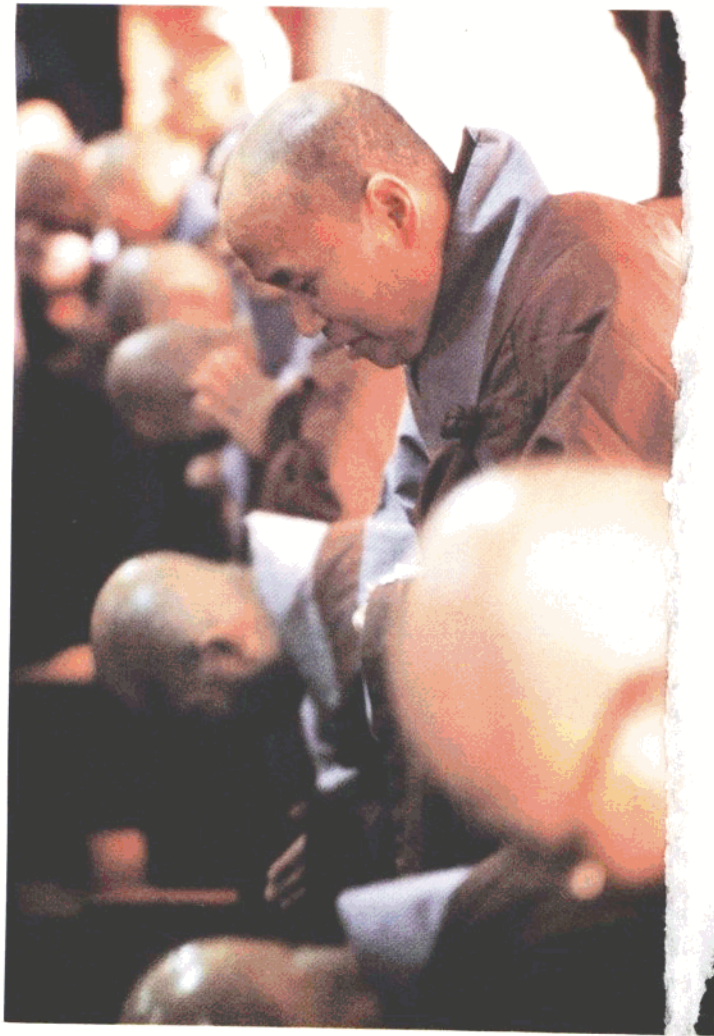
汉城农业大学农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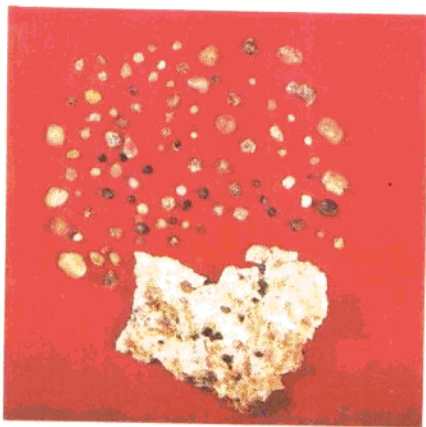
京畿科学高中



韩国佛教曹溪宗宗正——性徹大师



正在修行的性徹大师



性徹大师坐化后的舍利

文化人物 性徹大师

坐论佛道



追悼性徹大师的仪式



时 评	韩中文人交流的扩大	申东和 (1)
论 坛	韩国人的意识结构——试论其问题和解决方案	金泰吉 (3)
	韩国的所得分配不均等与所得再分配政策	权炳武 (6)
	从薪柴到煤气：50年来韩国人衣、食、住文化 的大变革	金惠善 (9)
	妇女在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韩今玉 (12)
报 道	第九次韩国学国际学术会议概述	李存山 (15)
	第三届环太平洋韩国学国际会议简介	沈仪琳 (18)
文 化 人 物	性微大师的生平和思想	睦楨培 (20)
韩 国 名 城	以孝道精神闻名的文化音乐之城——水原市	(23)
访 韩 印 象	韩国人的民族自强精神	韦 山 (26)
论 文 集 萃	新现实与新法则	李明贤 (28)
	中韩两国的寓言传统	朱靖华 (35)
	从《论语》、《孟子》看定义行政的三个范畴： 人、事、方法	李文永 (41)
	半岛流亡人士与中国东北的抗日运动	金弘明 (47)
	“亚洲价值、西方价值与全球价值”争论的实质	张海晏 (53)
	现代韩国儒学的困惑与出路 ——从儒学在现代社会管理中的意义谈起	周月琴 (57)
文 化 交 流	中韩文化交流的多才使者——成元庆教授	朱靖华 (62)
	与远古对话——中韩跨海竹筏漂流探险记	金健人 (67)
	从唐罗琴棋书画看中韩文化交流	田廷柱 (69)

机 构 介 绍	建国大学	(71)
	退溪学研究院简介	李允熙 (74)
书 刊 评 介	为韩国生活伦理定型的巨著	
	——评金泰吉《韩国伦理的再确立》一书	金炯孝 (78)
韩 国 经 济	韩国经济发展及其战略变化	李相文 (81)
	韩国对外投资的特点与走势	宋 魁 (83)
	90 年代韩国农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	金承权 (86)
资 料	韩国的中小企业	于 游 (89)
连 载	韩国的故事——以佛佑神助为主题的三国时代神话文学	朴湧植 (93)
杂 谈	韩国古代饮食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王明星 (98)
补 白	中韩西藏文化艺术研究所在拉萨成立 (14) 蓬勃开展的韩国围棋活动 (19)	
	杭州大学招收首批中韩关系史博士生 (27) 韩国人与汉字 (40) 韩国人的	
	饮酒习惯 (61) “东方思想与社会发展”国际学术会议在汉城举行 (66)	
	中韩建交四年来两国关系发展成就辉煌 (73) 奇迹从何而来:《韩国现代化	
	研究》一书出版 (85)	
照 片	汉城南大门 (封面)	
	学术动态 (封二)	
	韩国文化遗产	
	水原市风光	
	性徵大师	
	韩国的围棋活动 (封三)	
	大型民族传统游戏——环争游艺 (封四)	

韩中文人交流的扩大

● 申东和

1992年韩中建交以后，两国间开展社会、经济等全方位交流，试图一举弥补过去50多年间断绝的空白，使这种交流发展到令人刮目相看的程度。早在建交前，两国就已经形成相当水平的经济交流；同时，文化艺术领域的交流也以民间非正式的形式增加着。

本人于1986年筹备汉城亚运会文化艺术会演时，曾为邀请上海交响乐团访韩而努力，但因两国未建交而没有成功。作为曾经有过这种遗憾的文化艺术行政管理人员，在思考具有如此悠久历史的韩中关系时，当然认为最近急剧发展着的两国间的交流尤其是文化艺术领域里的交流是理所当然的，并拟在1996年韩国文化艺术振兴院和中国文化艺术界联合会共同举办的“韩中文人交流”工作中，从务实角度付出最大的努力。

韩中政府间，根据文化协定，作为民间形式的交流窗口，1995年度交换了韩国文化艺术振兴院和中国文化艺术界联合会的合作意向书，商定了两个机构的有关人员的交流计划。

让我们考察一下建交三年来共同推进的韩中间文化交流的业绩。1994年文化艺术振兴院派出的汉城艺术团参加了中国文联主办的“第三次中国国际民间艺术展”及在北京保利大厦剧场的一次公演（1994年8月18日）。1995年，作为“韩中美术交流展”的一环，在两国首都轮流举办了“现代韩国画展”（5月25日—6月3日，北京，民族文化宫）、“现代中国画展”（9月16日—25日，汉城美术馆）。1996年10月中国湘西土家族自治州歌舞团参加“汉城国际舞蹈节”等“韩中文人交流计划”正在协商之中。

此外，韩国文化艺术振兴院对韩中间纯民间的各种交流给予财政支援。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和中国对外展览公司共同推动举办了韩中美术交流展，以个人经营的画廊和文化事业计划人出面邀请中国美术家举办艺术展等方面的活动也呈剧增的趋势。

然而，未经政府或艺术界、学术界审查的文化艺术、学术领域的过多的交流，令人产生了稍微过火的忧虑，其对两国人民之间产生不友好情绪的影响则是不能等闲视之的。东亚国家的文化和艺术，以称为东方文化的大前提为基础，每个地区、民族形成独特的发展形态，产生并形成独创的新的个性。考虑到这些情况，对于韩中两国所具有的传统艺术的连结环节直到现代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产生并发展了什么样的独创性，需要系统地检查和了解。因此，在以民间形式进行广泛的文化交流的同时，也有必要由公共职能部门加以适当的整理。特别是，对在长达50年的隔绝之后重新恢复关系时容易产生那种兴奋，也需要整理。

早在建交前，韩国各领域的有识之士与中国的有关部门、团体之间就已进行交流，如：陆完顺现代舞蹈团在上海公演、韩国舞蹈家梨花女大教授金梅子与中国舞蹈学院的交流、民俗艺术专家沈佑声在北京大学的讲演等。两国在精神文化领域里的交流和增进理解方面，进行还算顺利。不过，可以认为，现在已经到了进行系统的交流的时候了。

至今，韩中两国的文化交流，可以认为是偏重于不太敏感的公演艺术领域，尤其是在传统艺术和美术领域。汉城、北京、东京等三个城市每年轮流举行的“Beseto戏剧节”等正在向现代艺术领域的定期交流方向变化。但是，与这些领域相比，在更

为基本的用语言表现人们精神的文学领域的交流则不太理想，有必要对此予以关注。

大体上说，很了解中国古典文学的韩国人和很了解韩国古典文学的中国人较多。相比之下，在现代文学方面，两国几乎都处于互相不了解的状态。从韩国现代文学的汉语翻译情况看，自1983年至1995年间只有13篇；中国现代文学的韩国语翻译作品，自60年代至90年代，只有小说及戏剧作家147人的287篇，诗、散文作家23人的101篇。

按理说文学领域从其属性上看比起别的领域来应当更容易进行交流，而韩中现代文学交流并不活跃的原因是什么呢？本人认为，文学是形成“人们精神文化上的艺术中心”的最重要领域，在绝对有必要增加韩中文化艺术交流的今天，作为文化艺术行政管理人员，对增加现代文学的交流给予格外的关心，是理所当然的事。

从在海外介绍韩国文学角度上看，韩国文人通过国际组织进行的国际交流是比较活跃的，但很难说与中国等邻近国家间的现代文学作品的交流正在有效地进行。这里面有各种原因，但主要是由于没有构筑促进邻近地区间文学交流的协助体制，缺乏相互促进、进而将东方文化世界化的认识。

特别是，韩中间的现代文学交流已成为当务之急，因为两国自古至今从精神上维持着密切的关系。无可否认的是，韩国属于汉字文化圈，作为文学基础的语言本身也以汉字为基干。从两国间的历史关系来看，具有韩国单方面接受中国文学的一面。反之，中国人可能有这样的自豪感，即认为中国文学自古至今主导东方文化，邻近国家受中国文学的影响而发展了自己的文化。中韩两国的文学交流怎样，这应是由学者专门作出判断的事情，但从行政管理人员的务实角度看，尽管韩中文学交流或许曾是单方面的从属关系，但在西欧诸国对东方精神、哲学、思想更加关心的今天，应强调不要错过以平等关系进行交流的时机。

现代文明的手段使世界更加接近。与只关心本地的时代不同，现代人所关心和思考的幅度扩大到难以想象的程度。这种变化在文学领域也不例外，这一点从韩国或中国现代文学界的动向中可以得到充

分的证明。主张以平等关系进行文学交流的理由是，应当今全世界集中于东方的视线，作为“使人理解我们的情绪和精神世界，有效地将世界秩序引向国家、人种间平等、和平的和谐状态”的契机。为此，东方邻近国家间的文化也要积极进行交流，尤其是进行文学领域的交流。在现代社会里，按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圈对文化的独创性作一比较，从而取得更好的发展，这也是不可避免的。

不以文化发展为前提的经济增长，只不过是空中楼阁。这种见解不必重复。现在，应有效地重新整理适应现代社会的艺术上、文学上、学术上系统的东方思想。在这方面，上述由公共机关按长期计划进行的韩中文化交流，是十分必要的。

不管哪个国家，对出版物的限制似乎都比较严格。特别是，在以儒教思想统治的封建时代较长的韩国，对国民形成良好风俗有害的作品，及对大众化的杂志的限制，更是十分严格。中国对出版物的限制也是如此。因此，两国间的文学交流应首先创造文人和学者能够正式见面的机会。通过自由议论自己国家现代文学所关心的问题，了解对方国家的立场，并以这种了解为基础，形成共同关心的问题，从而形成召开讨论会的条件和气氛。经过这样的过程进行的文学交流，与民间形式自然形成的文学介绍是不同的，它由公共职能部门经过协商，选定代表自己国家的现代文学作品，并在对方国家以平等的条件，谋求翻译出版，这是应该做的基础性的工作。

在1996年度韩国文化艺术振兴院和中国文化艺术界联合会协议中的“文人交流”的构想，应成为取得这些成果的基础。祝愿中国文人给予韩国现代文学以更积极的关心。以上从行政管理人员的立场记述的内容并不是专业性的，只是概括性的叙述。对此，请读者给予谅解。同时，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观点与韩国文化艺术振兴院的政策毫无关系，只是笔者个人所见而已。

（本文作者：韩国文化艺术振兴院国际
交流部长，崔成万译）

韩国人的意识结构 ——试论其问题和解决方案

● 金泰吉

一、现代韩国人的意识结构

1. 几种基本特色

意识和意识结构，它本身是看不见的，只是反映于行动方式乃至生活态度上。随之，我们观察人们的行动方式乃至生活态度，以捉摸他们的意识结构。然而，人们的行动方式乃至生活态度各异，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里也有行动方式乃至生活态度的变化。所以，把数千万韩国人捆在一起，确定“韩国人的意识结构”，无论如何是很难做到的。

然而，从宏观上考察韩国人的行动方式乃至生活态度以发现左右整个潮流的几种基本特色，还是可能的。说明白一点就是，要了解所有的人经常表现出来的行动方式乃至生活态度是困难的，但要想了解多数人在多数情况下表现出来的突出的行动方式乃至生活态度还是可能的。同时，从韩国人的行动方式乃至生活态度中发现的一般性的基本特色决定着韩国现实动态的整个方向，因而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东西。

我们能够通过韩国人的行动方式乃至生活态度

的一般倾向发现的韩国人意识结构的基本特色，笔者认为可以指出以下四点：（1）感情优于理智；（2）相对于整体而言更热爱部分的倾向显著；（3）相对于内涵而言，更重视外形；（4）相对于内部价值而言，更有被外部价值吸引的倾向。以上四个基本特色，互相之间都有联系，作为基础的则是感情优于理智的民族气质。尽管不能说不论何时都必然那样，但大体说来，具有感情优于理智的气质的人们比较容易热爱部分（非整体），且有尊重外形（非内涵）的倾向。同时，大致说来，智性较高的人们有重视内部价值的世界（非外部价值的世界）的倾向。

韩国人中，不管是出于好意还是歹意，热心肠的人很多，即多血质性的人很多。在韩国，人们传统上不喜欢辨别是非、比较机灵和细致的人，而对憨厚和圆实的人则给予好评。从各方面观察韩国人的生活态度时，我们可以接受韩国人是感情优于理智的民族的观点。

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是相对的。同太阳系这个整体相比，地球是一部分；相对于韩国或美国这样的单个国家的国土而言，地球是整体。家庭是国家的一部分，个人是家庭的一部分。“比整体更热爱部分”，这就意味着热衷的范围比较狭小。这里所说的“比较”可以理解为“根据某种情况的要求”的意思。

我们面临的情况是，人类应成为一体，以搞活整个地球。然而，世界上很多国家陷于各自的国家利己主义之中，显出与人类整体相对而言更热爱作为部分的国家或民族的利益的倾向。韩国人的情况是，不仅有相对国家或民族而言更热衷于小集团的利益的事例，而且只热爱自己个人利益的人也不少。我们所处的情况，要求我们考虑整个人类的“大我”的形象，然而实际上却是只考虑自己个人的“小我”的形象的做法成为主流。

就说以自己个人为主吧。假如能采取为了自身的整个生涯和完全人格的具有伟大眼光的生活态度，那么自然会唤起为他人和共同体着想意识。然而，今天的韩国人具有不是为自身的整个生涯和完

全人格，而仅仅执着于不过是生涯一部分的眼前的倾向，有很多只热衷于满足相当于自身一部分的瞬间的欲望的事例。

韩国人有相对于内涵而言更尊重外形的倾向这种看法，也可以用我们日常的观察给予证实。欧洲各国喜欢坚固和安全的小汽车的倾向，但在韩国则有喜欢不坚固和不安全而体积大的汽车的倾向。用国库钱财兴建的纪念馆或其他公共设施，只讲外貌庞大华丽而内容不实的情况很多。政府或其他公共机关在筹建图书馆时，为兴建图书馆建筑物可以不惜制定巨额预算，但对建筑物内备置藏书的预算则吝啬得很。同样，在韩国生产的衣类或鞋类，只要贴上外国的著名商标，不管价值多么昂贵都会畅销，这也可以看作是过于尊重外形的证据。

韩国人意识结构的第四个基本特色，可从相对于内部价值而言更注重外部价值的生活态度中找到。对于价值的本质，可以有各种主张，但需要明确的是价值里有给予满足人们欲望的力量事实。如果这种满足欲望的力量主要在人的精神和生命中，称为内部价值，不然就称为外部价值。

内部价值的典型例子有生命和健康、爱情和友情、学问和艺术、宗教和思想、教养和人格、自由和和平、公正的社会的建设等。外部价值的代表例子有钱财、权力和地位、肉体的快乐和充裕的消费生活等。所谓韩国人喜欢外部价值的倾向，并不是说看重外部价值的人多，而是说处于两者必须择一的情况时，以实际行动选择外部价值的情况很多。

2. 韩国人意识结构中的问题

前面提到的韩国人意识结构的四种倾向也有好的一面。比起理智来感情更占优势的气质，对共同的创造和艺术的生活化来说是有利的条件。另外，它又可以成为创造人情丰富的社会的基础。不是对整体而是对部分热爱时，我们的爱情可以增加浓度，可以结成乡土爱或家族爱的果实。对外形的尊重是发展艺术的必要条件，对礼仪生活也有帮助。同时，对外部价值的不知疲倦的追求，也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珍贵的动力。

然而，总起来看，上述四个倾向缺点多于优点。在从前的农耕社会里，感情的偏重对圆满地搞好人际关系有很多帮助；但在今天的产业社会乃至信息社会里，它反而有助长人们相互间发生纠纷的倾向。

在农耕社会里，偏重感情的倾向容易发展成血缘之情或地缘之情那样的亲近和睦的感情；但在生存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里，反而容易发展成憎恶、妒忌或愤怒等不和的感情。从前，人们交往的范围狭小，所以他们之间的纠纷也多具有单纯的特点，平时积累的正义的力量在消除纠纷方面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然而，在现代社会里，人们的利害关系广泛地交织着，其纠纷的规模和内容庞大而又复杂，所以非至诚、冷静、公正的对话，则难以找到解决办法。因憎恶和不信任之类的感情的迸发，而致使纠纷加深的情况也不少。

对部分的热爱，如果其程度不过火则没有问题，但若缺乏意志的自制，则很容易过火。对部分的热爱若过火，则会陷入狭隘的利己主义，会带来很多弊端。同时，看不到自身的完全人格和整个生涯，只顾生物学的欲望和眼前的利益，则势必因小失大。

偏爱外形的最大借口是保存内实的安全。然而，对外形关心过火就会带来内实的贫困，从而本末倒置。不仅如此，对外形的无节制的热爱会导致虚荣，从而助长虚礼和虚设。同时，虚礼和虚设引起摆阔和浪费的风气，摆阔和浪费不仅使个人和国家的经济趋于破产，而且加速自然资源的枯竭和自然环境的污染。

不喜欢内部价值而喜欢外形价值的风气的弊端，比前面提到的三个倾向的弊端更为严重。在这种价值风气里生活的人，相信占有的极大化或者享乐的极端化是幸福的保障。对他们来说，拥有与享乐越多越好，对占有与享乐的欲望是无尽无休的。然而，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可以分配的外在价值的总量是不能任意增加的，因此以占有与享乐的极大化为目标的人们之间过于剧烈的社会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在过分剧烈的社会竞争中，人们的利害关系当然要像刀刃那样对立，难以指望他们为共同目标而合作。不搞合作，只顾追求增加各自的占有与享乐，会使社会失去秩序，易于崩溃。

韩国现在患的所谓“韩国病”的各种症状，其根子都在于过分地爱好外形价值的价值风气。不正之风的核心是权钱结合，而权钱结合的原因在于追求显示外形价值的权力和金钱。摆阔和浪费的人多，也起因于显示金钱或相信无节制的享乐是幸福的价值观。

在以权力或金钱为中心的剧烈的社会竞争里，只有少数胜利者如愿以偿。从此，贫富差距拉开，贫富纠纷深化。贫穷阶层以为自己的贫穷起因于社会结构的矛盾而表示不满，而富有阶层因贫穷阶层的不满和反抗而感到不安。不仅如此，穷人对享乐的欲求也无异于富人，所以也产生偷窃、抢劫、强奸等犯罪行为。父母和子女都奔着权钱而千方百计考虑上大学，所以上大学的问题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升学考试失利的年青人自暴自弃，青少年犯罪问题也随之而来。

二、考察解决方案

1. 意识结构和社会结构

人们的社会结构和他们所生活的地方的社会结构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人们的意识得病，那么他们所造就的社会结构也易于得病。反之，若社会结构健全，那么在其中生活的人们的意识结构也易于形成健康状态。换言之，不纠正社会整体的结构矛盾，个人的不当意识也难于端正。不端正个人意识，就难以消除社会结构的矛盾。

在此，我们碰到非常难办的问题，即“意识改革和社会改革中，先从何入手”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可以说是“同时着手最好”。假若同时进行这两种改革在现实上不可能时，应从可能的地方先开始。

然而，更为根本的问题是，人们可能提出“人们的意识和社会结构都有病时，由谁先掐断恶性循环的环节、开始解开改革的线头”的问题。掐断恶性循环的环节本身从理论上说就是不可能的，这确实令人悲观。但在这个问题上，给我们以勇气的是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在意识上总有领先于他人的先知先觉者的事实。尽管世界混浊，社会腐败，但在这种不幸的状态里，理当有感到危机的人，他们的危机意识和对改革必要性的自觉，将成为新时代的种子。

在韩国人的意识方面，自称领先于别人的先知先觉者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确立军事政权的执政当局，另一类是称为“运动圈”的大学生。前者谴责国民的意识结构不对头，并提出“意识改革”的口号。后者指出韩国社会结构的问题，企图颠覆体制。这两类人正面对立，形成两个阵营，互

相非难，但他们之间也有共同点。其共同点之一是，他们同样都热爱民族和国家；另一点是，他们彼此互相批判尖锐，而自我批判却懒惰。

“5·16”军事政权初期提出的口号中，有“人的改革”，也有“一扫旧恶”。根据朴总统的命令，1969年制定并宣布了《国民教育宪章》。在此前，提出了“第二经济”，强调伦理的重要性。“重塑国民运动”和“新村运动”是有组织的国民伦理运动。在各级学校里，以“国民伦理”为重要课程，从社会教育角度坚持不懈地开展国民伦理运动的第3共和国的政策，第5共和国和第6共和国照样继承下来了。然而，这种政策并没有收到什么效果。为了不重复其失败，有必要考察其失败的原因。

军事政权下的意识改革尝试和运动没有取得成功的第一个原因在于，它们不顾社会结构矛盾，只注意意识结构。解放后，在韩国，社会上不合理的东西积累太多而成为习惯，因而导致看不见的结构僵化的情况不少，如“政经勾结”贪污公共财产、银行贷款时的“回扣”风、白信封里装的“寸志”（家长给小学任课老师的贿款）等。在充满结构矛盾的社会里，为了生存下去，其意识结构也要适应这种矛盾。因此，所提出的“要诚实地生活”的口号，只不过是充满伪善的空话而已。

军事政权的“意识改革”即国民伦理教育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负责教育的执政当局是没有得到受教育者支持和信任的具有很多弱点的集团。为取得教育效果，教育者应受到被教育者的尊敬和信赖，但军事政权很难得到向往民主主义的大多数国民的尊敬和信赖。不过，如果他们率先垂范地努力接近高度的道德性，也有可能得到国民的信赖。然而，他们只强调国民的道德性，对自己的不道德却很迟钝。

至今意识改革运动未取得成果的第三个原因，是这个运动缺乏理论准备，马马虎虎，没有计划。解决“意识改革”的问题，应动员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各个领域的专家有组织地进行，需要各个领域的专家为解决这个问题而进行合作。但当时的韩国学者忌讳被污为“御用学者”，不愿积极参与政府组织的活动。结果，活动只是向一些二流学者作咨询，草草地作了理论准备。

2. 几点意见

与外部的社会结构或以法律规定的制度不同，

人们的意识结构并不是在短期内就可以拆散并修好的东西。以为这是容易解决的问题，以为提出像样的口号，搞一下运动就可以获得很大成果的想法应当抛弃。作为综合对策的一环，口号是必要的，搞一下运动、造成气氛也是必要的。经过 30 多年，诞生了文人政府，总统首先显示出清算不正之风的意志。一部分既得利益者也许会有反抗，但大部分国民是肯定性地接受政府意志的。可以相信，我们迎来了把韩国建成富饶而自豪的国家的难得机会。为了不致于虎头蛇尾，我们应集中智慧和力量。

政府应不放松纠正不正之风的努力，坚持不懈地向前推进。果敢地改革社会结构中的不合理性，逐渐改正不合理和不公正的制度。然而，过分地张罗反而会引起冲击和副作用，因此，凡事都要按周密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

首先，应确立法律秩序，极力端正社会纲纪。要用实践显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道理，要将法律对弱者严格、对强者宽大的不信任一扫而光。处于高位的人应率先垂范，遵守法律。特别是执法机关工作人员，要严格要求自己。

意识改革不止于改变“想法”，而且“行为”也应改变。为改变行为，应遵守道德，遵守道德应从日常生活小事开始，并养成习惯。为了对容易减弱的个人道德意志进行鞭策，开展互相叮嘱、互相激励的集体活动也会有好处。

占有的极大化和享乐的极端化是保障幸福的最高价值这种扭曲的价值观应予以清算。要进行有很多东西比钱、权力或享乐更重要的价值观的教育。为了教育子女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要改变父母的人生观。为给学生讲好价值观，教师要改变教育观，各级学校教育要有划时代的变化。父母和教师需要进行自我教育，宗教团体和言论机构等公共机关应从社会教育角度帮助他们推进这种教育。

如果以为这项工程过于巨大而发出冷笑或退步，那么光明的未来是不会到来的。须知这不是轻而易举地一蹴而就的目标。

为解决我们意识结构和社会结构中的问题，应首先将能办到的事情付诸实践。然而，我们的问题并不是靠某种灵丹妙药就能根本解决的单纯的问题。特别是，意识改革的问题是要经过长时间才能解决的课题。为解决这一课题，要有综合的、系统

的研究作后盾。

能够充分地阐明韩国人的意识结构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伦理学并不是现成的。我们的问题并不是在桌面上就能解决的观念性问题，而是需要经过试行的经验性问题。这是需要边实践边研究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各领域的专家应协作研究的问题。为了这种协作研究，应组织相应的机构。

消除社会矛盾，改善制度，确立公务员的纲纪等项，应由政府直接办理。可是，一般国民的意识改革，则应由民间运动推进，这样效果会好些。如前所述，可能需要由政府支持综合研究机构。但即便那样，对研究机构的活动，政府也不要予以干涉。检查由国库支出的预算支出使用情况，当然不属于“干涉”的范畴。

(本文作者：韩国汉城大学名誉教授，
崔成万译)

韩国的所得分配 不均等与所得 再分配政策

● 权炳武

1. 所得分配变化的时代划分

韩国经济自 1962 年起以五年为单位阶段性地推进经济开发计划，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量的成长。但是，质的经济发展成果却未能满足人们的期

待。技术开发不尽人意,产业间联贯效果差,专卖店结构的落后,外资依存度的加深,开发性通货膨胀的蔓延,分配不公问题,能源危机,环境污染问题,粮食不足问题,劳动力供求的不均衡与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国际收支赤字,社会间接资本的不足与制度的不完善,企业集中现象严重,中小企业破产,地区经济不均衡的加剧,劳资纠纷增加等等难以全部罗列的众多经济、政治、社会问题,可以说正是由量的经济成长的一边倒政策而引起的“韩国病”。

在如此众多的问题中,我们关心的领域是所得分配的扭曲现象。在经济成长乃至发展过程中,由于经济政策手段的种类和强度不同,所得分配的实况也有所不同。综合众多学者的研究结果,韩国所得分配的变化可以分为以下三种局面:第一种局面是在60年代后期,是所得分配状态得到改善的时期;第二种局面是从根本上发展经济的70年代,是所得分配状态急剧恶化的时期;第三种状态是80年代,是所得分配状态得到重新改善的时期。

呈现第一种局面的时期,失业与不完全就业的情况严重,绝对贫困成为主要的问题。因此,政府采用外向型的开发战略,积极扶植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这种开发战略的结果是,与财产所得相比,劳动力价格与工人工资急剧上涨。一般来说,由于与财产所得相比,劳动者得到了公正的分配,因此可以说当时的发展战略对劳动者收入的改善起了积极作用。在呈现第二种局面的时期,政府为了扶植重化学工业,动员了所有资源为大企业集团服务,从税制上为大企业提供支持,并给予实际利率为负数的政策性金融服务等,还集中给予各种行政上的支援。这一系列的优惠条件只重视特定产业部门和特定企业,使分配被歪曲和恶化。同时,年平均20%以上的物价上涨率,城市与农村间收入差距的增大,大城市与中小城市间收入差距的增大,不动产价格的上升等使工薪阶层的收入相对萎缩,成为分配状况恶化的主要原因。呈现第三种局面的时期,政府取消了各种租税优惠,缩小以至废止各种优惠的政策性金融措施,并采取各种办法稳定物价,使70年代一度恶化的所得分配状况得到改善。80年代以后,低学历的蓝领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现象使各学历间分配差距缩小,结果使城市家庭的所得分配得到

了改善。

2. 资产与财富分配的现状

有关韩国的财富与资产的不平等的研究,基本上处于未完成状态。首先,让我们观察一下不动产占有的不均衡现象。在所有的私有土地中,5%的人占有65.2%,10%的人占有26.9%。由此可见,土地资产占有的集中程度大大超过分配所得的集中程度。不仅如此,考虑到由于地区的不同而造成的很大程度的地价差异,通过分析以公布地价为基准的土地所有的不均衡状况时可以得到,1%的人占有全部土地价值的27.9%,5%的人占有50.6%。如果将按土地面积基准计算的占有比率与按公布地价基准计算的占有比率相比较,可以发现,越是上层阶层,所占有的单位价格较高的土地就越多。

现在,让我们分析一下金融资产占有的集中程度。前10%的阶层占有总金融储蓄的41%,金融资产占有的不平等程度比收入不平等要高。

3. 按功能和集团划分的所得分配状况

1) 按功能划分的所得分配状况

为了便于理解按功能划分的所得分配状况,这里首先提出关于“劳动所得分配率”的概念。“劳动所得分配率”是指劳动所得(工资)在净国民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从1953年到1993年的40年间,韩国劳动所得分配率的变化趋势呈现逐渐增加的长期性倾向。1953年在25.8%左右徘徊的劳动所得分配率,到了1993年已经增加到60.6%。韩国经济在70年代中期以前,主要把以轻工业为主的出口产业作为战略产业来开发。之后,由于以扶植重化学工业作为开发战略,以70年代中期为转折点,几乎看不到此前因无限制的低工资劳动力供给而造成的劳动力价格上升,从而出现劳动所得分配率上升趋势的情况。

2) 集团间、地区间的所得分配状况

在韩国,90年代以后,特定集团间的收入差距正在显著缩小。首先,在1990年以后,蓝领职工失业率的下降和劳动力的不足使不同学历的收入差距正在缩小。如果以高中毕业生的收入为100计算,大学毕业生的收入在1980年为228.5,1994年为155.7,正在显著减小。

如果按性别分析所得分配的差异,那么1975年女性劳动者的工资与男性劳动者的工资相比较只占

42.2%，到了1994年已经改善到56.8%。分析城市与农村的收入差距时，却看不到显著的变化。农村家庭的月收入与城市家庭月收入的比率，从1965年的99.7%到1994年的99.5%，变化幅度极其微小。

4. 关于所得与财富分配的见解

从上述分配状况中可以看到，韩国的分配不均正在逐渐得到改善。但是，关于所得与财富的分析结果中还存在许多问题。例如，从家庭调查资料的情形来看，可以指出各阶层的分类中，最上层家庭的报告存在数字过低的问题，因为按资产划分，富有层较多占有的资产——股票、证券等金融资产的占有情况是无法准确估计的。

在对土地财产占有的集中程度的分析中，同样也存在着问题。由于不是以家庭为单位而是以个人为单位分析占有状况，土地按每个家庭成员分散占有时，不平等的状况就会有相当程度的变化。

5. 所得不平等的主要原因

收入的差异虽然会由于个人能力的差异而发生，但更主要的是受当初占有财产的多少和运用经济政策的结果的影响。韩国经济飞跃式的成长与发展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一点从以下各方面都可以看到：“新村运动”取得的农村的外向型发展，以出口为主的工业化政策的成功，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的干部体系以及使其运转的优秀技术力量，等等。但是，也应当看到，在这种经济成长的背后，也存在着社会经济的扭曲现象。只有以这种态度，才能找出与成长的好处相抵销的否定性现象，并试图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韩国，造成所得的不平等分配的原因主要有：第一，财产拥有的差异；第二，能力的差异；第三，教育、训练、机会的差异；第四，年龄与健康状况的差异；第五，随着经济成长而来的个人收入差距增大的现象。

特别是，在经济成长过程中，贫者益贫、富者益富的现象日趋严重。由于通货膨胀，实物资本所有者可以保持其财产的价值，而非实物资本所有者，如劳动者及工薪阶层，则由于货币贬值而引起实际收入的损失，收入差距由此而变得更大。而且，在加快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政策朝着有利于资本家的方向展开，资本家与非资本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只能越来越大。同时，在推进出口主导型开发政策

的过程中，为了强化出口竞争力而抑制工人工资水平，而为了给企业创造有利的政策环境和维持工薪阶层的生计又必须抑制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这样，工人和农民只能变得相对贫穷。

6. 所得再分配的政策手段

所得再分配是指经济政策的主体——政府利用经济政策手段使社会的所得分配发生变化，即：由于市场经济机制决定所得分配不平等，所以要以这种社会均衡政策来缩小收入的差距，以维持均衡状态。这种向平等的推进是以弥补资本主义的缺点、提高国民的经济福利为目的的。

韩国经济虽然有诸多的所得再分配政策手段，但是这些政策手段并没有被强有力地运用并取得成效，这是韩国经济的问题所在。作为政策手段的有：税率调整，免税店调整，对以财产所得的课税调整为对象的税收调整政策，等等。

一般来说，应对一定额以下的个人所得实行免税，对高所得层实行累进税，以调整租税收入，努力通过财政支出实现社会再分配。韩国的政策手段推进不得力，可以从以下两种忧虑中找到原因：首先，高收入层税率高时会使得企业活动萎缩而妨碍经济成长；其次，对资本以及对利息收入的重课税会妨碍国民储蓄，妨碍投资财源的积累。

就间接税而言，对生活必需品课以低税，对奢侈品和嗜好品定高税率，正在成为一般倾向而被接受。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继承税和赠与税来修正收入不均的最重要原因——拥有财产的不平等。但是，在通过间接税的调整而达到目的方面的意志不足，由于顾虑到继承税和赠与税的高税率会使私人企业萎缩，妨碍以企业家创意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优点的发挥，使政策手段的作用显得极其微弱。

以下，让我们分析一下作为再分配政策手段的财政支出政策。

用于教育设施、卫生设施、医疗设施、住宅建设的政府财政支出，以及各种年金、失业津贴、家庭津贴等社会保险、社会保障制度等政府财政支出政策手段，在某种程度上收到了成效。

另外一种政策手段是以市场干预为依据的所得再分配政策。较有代表性的政策手段是对农产品价格的支持政策。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所得与其它部门相比有了相对的减少。为了缩小这种差距，有

必要实行农产品价格的支持政策。而且,为防止在供给过剩时因需求弹性低引起的价格暴跌和农民的收入减少,也要求有这种价格支持政策。农产品价格的支持政策,可以使农产品与工业制品的交易条件维持稳定,具有保护农业收入的优点。但是,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如下缺点:有可能助长通货膨胀;这种政策的好处主要归属于富农层,一般农民几乎得不到增加收入的好处。这种政策从国民经济的角度来讲,意味着资源的非有效分配与利用,在促进产业高度化的过程中,资本与劳动力从生产性较低的农业部门转向生产性较高的制造业、社会间接资本和服务行业有可能会受到妨碍。出于此种判断,这种政策手段也未能具备一贯性并取得实效。

以市场干预为依据的所得再分配政策手段,可以以最低工资制为例。即以法律的形式确定最低工资水平,以保护在工资谈判中处于不利位置的劳动者。同时,还设定最高工资上限,以缩小工人、工薪阶层的收入差距和不平等。韩国自1970年实行这种最低工资制度,但由于规定的标准过低,其所得再分配的效果几乎没有显现出来。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韩国的经济政策措施是采用以上提到的各种政策手段,努力纠正收入不平等,消除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分配不公,使低收入层的收入增加,使劳伦斯曲线上的不平分配曲线更接近完全均等分配曲线……但人们只是可以看到手段的微弱和渐进改善的趋势,分配的不平等现象并没有得到全面改善。

(本文作者:韩国建国大学经济学教授,杨露译)

从薪柴到煤气: 50年来韩国人衣、 食、住文化的大变革

● 金惠善

俗话说,时过十年,江山也要变。从光复之初到50年后的今天,韩国人的生活方式也像逝去的岁月那样,改变了许多。

过去50年,韩国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从1962年实施第一个五年经济开发计划开始,直到进入新的文民政府时代,实施与经济发展同步进行的以社会发展为目标的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为止,为了丰富韩国人的生活,作出了很多努力。经济的发展,使韩国从最贫穷的国家发展为世界第12大经济强国,从而也提高了韩国人的经济生活水平。1945年韩国人口为1687.3万人,到1995年增长为4485.1万人;人口平均寿命1960年为52.4岁,1991年增加到71.6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53年为67美元,到1994年增长为8483美元。出口额1948年为22.3万美元,1994年为960.132亿美元。1945年登记注册的汽车为6337辆,到1994年则增长为740.4万辆,轿车由1311辆增长为514.8万辆,从而进入了普通家庭也拥有一辆轿车的时代。

这种社会经济的变化,直接反映到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50~60年代曾被视为青黄不接的饥饿时代,而如今则进入了担心营养过剩、控制饮食生活的减肥时代。

1. 食:从缺乏营养到提倡减肥

• 9 •